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Rhetoric

修辞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第三辑）

祝克懿 主编

修辞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

(第三辑)

主编 祝克懿
编委 储丹丹 王静 黄兵

復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辞的结构与功能研究：“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第三辑/祝克懿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5
ISBN 978-7-309-14240-2

I . ①修… II . ①祝… III . ①修辞学-文集 IV . ①H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5680 号

修辞的结构与功能研究：“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第三辑)
祝克懿 主编
责任编辑/方尚芩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32.5 字数 504 千
201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240-2/H · 2889
定价：8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新年寄语

- 新年寄语(代序) 祝克懿 2

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 | | | |
|-------------------------|-----|--------|
| 主持人语 | 陈光磊 | 6 |
| 论语体风格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 丁金国 | 7 |
| 陈望道的语境理论对新媒体时代新闻语境研究的意义 | 袁晖 | 宫春辉 22 |
| 再论郑子瑜与陈望道 | 宗廷虎 | 31 |

特 稿

- | | | |
|-----------------------|-----|-----|
| 话语的结构与意义及话语分析的应用 | 陈平 | 42 |
| 普遍的语言学与“可怜的语言学家” | | |
|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龚兆华 王东亮 译) | 58 | |
| 导读 | 王东亮 | 58 |
| 重视语言信息结构研究 开拓语言研究的新视野 | 陆俭明 | 81 |
| 汉语篇章句及其灵活性 | | |
| ——从话题链说起 | 屈承熹 | 106 |

修辞学理论

- 作为语体变量的情景现场与现场描述语篇中的视点引导结构 刘大为 140

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及相关问题

——以变零构式为例	施春宏	174
学术文本读写身份转换：理论阐释与样本分析	谭学纯	198
语气词句末选用式及其系统研究	王 珩	214
南海仲裁案“裁决”书的批评性互文分析	辛 斌	235
确认与强调：“实”的主观意义和语用功能	杨永龙	246

汉语修辞

断言、知心与修辞立其诚	顾曰国	264
消极修辞对象的一般化及效果的数量化：从“的”的选用谈起	陆丙甫	于赛男 282
歇后语的结构与功能再探	束定芳	299
汉语流水句的分类研究	王文斌	赵朝永 313
论领域变体性质的职场汉语教学	曾毅平	326
从当代流行语看社会文化变迁	周 荐	刘静静 337

修辞与写作

主持人语	毛履鸣	350
语言工作与写作教学	布鲁斯·霍纳 (廖巧云 贾代春 译)	352
论辩写作教学：摒弃亚里士多德劝说论，采纳儒家谏言说	阿拉贝拉·里昂 (鞠玉梅 译)	365
发展阴阳修辞：从和谐互惠到异中互依	毛履鸣 (赵烨冰 译)	377

修辞与论辩

修辞论辩与受众的本质

——关于论辩中受众问题的理解	克里斯托弗·廷德尔 (汪建峰 译)	392
多模态论辩修辞框架探索	张德禄	416

修辞与新媒体

政务网站图像话语的政治功能初探

王建华 周毅 428

新媒体话语中错误—修补分析

——以新语体 QQ 聊天为例

徐赳赳 440

西方修辞学

修辞的功能与形式

巴里·布鲁梅特 (郭恩华 李秀香 译) 452

导读

王振华 460

副语言意义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

詹姆斯·马丁 米歇尔·扎帕维尼娅 (吴启竞 王振华 译) 464

连贯(coherence)还是“辩动”(cogency)?

——从“修辞结构理论(RST)”的得失看修辞对语篇研究的干预 刘亚猛 498

略论米歇尔·梅耶双重三位一体的修辞观

史忠义 向征 506

新年寄语

新年寄语(代序)

祝克懿

新元肇始，万象更新。2018年开端，学术气象即呈高泽雄厚、沛然劲发之势，并以新的面貌汇入社会发展大好的开局潮流里。

大数据时代，信息全方位沟通，跨学科发展成为历史必然。与社会语言生活最为贴近、最富活力生机的修辞学亦不再独守一隅，与邻近学科和相关学科相融相渗，探索修辞结构与修辞意义的规定性与异质性；开启主流语言学的理论范式，介引海外修辞学研究的新动向、新进展，逐步提升走向世界的学术自信。

始终把中国修辞学科建设作为一种理论自觉的《当代修辞学》也迅速把握时代脉动，重新确定学术时空中的历时、共时坐标轴，确定了上承修辞传统，下构当代品质，内涵中国修辞又外接世界修辞的理论范式。重视语言哲学、辩证逻辑、符号分析给予的方法论启迪，拓展宏观、动态、多元认知维度的修辞结构功能分析。主要刊发有理论建构、展现前沿研究方法和对修辞现象进行科学描写、多元阐释的原创性、研究性论文。构筑一种修辞学理论方法的“众声喧哗”；在中西多元文化交融语境下，搭建有学科发展理想的学术交流平台；形成修辞学术研究的向心力；努力实现修辞学“新理念、高标准、多范式、大格局”的当代追求。

作为这种理想追求的标志之一是自2018年始《当代修辞学》将启用寄托着学科理想的LOGO(见左图)。LOGO图形的上部是冉冉升起的朝阳，下部是波涛簇拥着的月形之舟，以学海之舟承载着东升之旭日象征修辞学奋发图强、蒸蒸日上。LOGO整体图形则显示《尚书大传·虞夏传》用清炼之辞描绘的“卿云烂兮，糲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盛大景象。

LOGO文字图形“日”寓意语言文化遵循的科学信仰和前贤后学的智慧之光。光照之下的“日”内图形寓意有二：

其一为古文字“文”与双“木”之“林”的结合体。关于“文”，许慎《说文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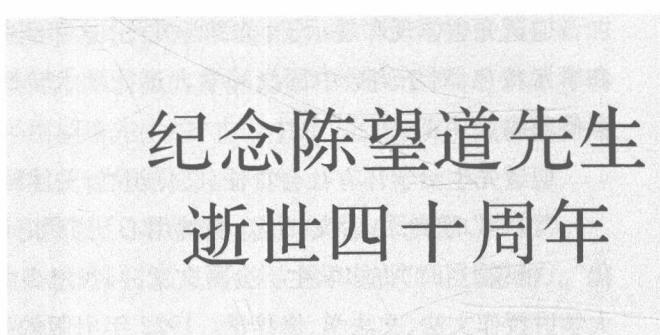


叙》界定为：“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修辞学其实就是在阐释这“文”“字”演绎的逻辑事理和语言运用的结构规律。而“文林”合体即喻古今中外修辞学术共同体之“文”“文字”“文本”“文章”在刊物汇合而成的“文林”“瀚海”。为了服务社会，“文林”传播求真的认知构想，介引科学攻关的课题，实现跨学科的知识共享繁荣，将前沿理念、科学方法渗透到各个研究领域。

其二为古文字“文”与“舞”的结合体。对“文”的感悟源自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的立意：“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提取刘勰的“形文”“声文”“情文”多元类型和互动交融义，表达现代意义上的“文本”研究需遵循“宏观、动态、多元”的理论维度和“系统、关系、层级”的理论模式。而“舞”专指古代儿童所习的一种“文舞”。从审美体验角度审之，“文舞”亦为“舞文”。此借“亦文亦舞”“一文一舞”拟说明修辞研究“学术规范与创造性思维有机结合”的学科定位；修辞表达灵动而富于生机，既具学术驱动力，又有适应社会语言生活丰富多样需求的功能。

LOGO 的寓意寄托着修辞学人新年里的奋斗目标和理想。在新的一年里，《当代修辞学》将立足当下，眺望远方，坚守办刊理念，砥砺奋进，努力实现 2018 年的期许与梦想！

(原载于《当代修辞学》2018年第1期)



纪念陈望道先生 逝世四十周年

主持人语

陈光磊

今年是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出版八十五周年，又是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这就有着双重的纪念意义。缅怀大师，致敬经典，不只是为了对历史传统的尊重与继承，更是为了从继承中创新，向未来阔步前行。

望道先生体现和展示于《修辞学发凡》这部经典论著中的学术精神、学术思想和学术特色，对于当今中国修辞学人进行学术转型，从事学术创新是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望道先生治学怀有社会责任、文化担当，关注时代的要求。

“五四”时期，白话文兴起，他就用心研究如何推行白话文，“把白话文完美化”。他说，当时“许多学生不会写文章，问我怎么做”，于是从1920年起就在复旦大学讲授作文法、文法学、修辞学。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对文章的构造、体制、美质作了系统阐释，是我国第一部白话作文法的专著。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更是“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新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也就是以自己的修辞研究直接回应白话文运动前进的需要，以助力社会文化的发展。

先生有言，“一切科学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视的影响”。诚然，修辞学要受时代的注重而不被鄙弃忽视，那修辞学就要关注时代的需要，为推进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面对中国社会、国际社会中冲突的爆发，危机的处置，对话的展开，合作的达成等等形形色色的话语问题，修辞学应当也能够做出有效的回应。可以说，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修辞学人应有的一份文化责任和学术担当。这样，我们就和当年陈望道先生的学术之心相通了。

望道先生治学主张融合中外，贯通古今，致力于理论创新。《修辞学发凡》正是先生践行“古今中外法”的辉煌成果。先生不止一次论说过，做学问“方法上要网罗古今中外”，同时又要“把古的、洋的都‘化’在我们的学术研究里面”，而使“我们的研究有我们自己的样子”。的确，《发凡》就是中国学术界最早引进和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修辞研究确立了“以语言为本位”的观念，指明了修辞研究的语言学性质；同时，他借鉴了日本等国外的修辞学研究成果，又对中国历代有关的修辞论说加以引用阐发，从而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理论

纲领,划分了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大分野,对汉语修辞方式作了系统的归纳与解说,并探讨了“语文体式”。这样,先生就构建了一个修辞学的体系,也确立了一种修辞学的研究范式。

著名修辞学史家郑子瑜先生评价望道先生是“彻底将中国修辞学加以革新”的“第一位修辞学家”,他在论析望道先生研究撷取外国修辞学成果时指出,“陈氏的修辞学仍旧是他自己的修辞学”,“同时也是中国的修辞学”。应该说,当今中国修辞学的学术转型,也就是一种学术创新或者说是一种学术革新。

面对社会话语、国家话语、国际话语的种种修辞问题,修辞研究需要开拓新的空间,提出新的问题,具有新的理念,探索新的方法,从而构建新的理论模型和确立新的研究范式。这很自然要采用望道先生的“古今中外”之道,使中国修辞学能以自己的学术形态和话语系统贡献于世界的文化学术。

望道先生治学态度谨严、厚积薄发、文风峻洁,历来为学人所钦佩、所景仰。

今天,我们更需要以先生为典型,为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而不懈努力。纪念望道先生,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中国修辞学前进!进!

(原载于《当代修辞学》2017年第5期)

论语体风格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丁全国

(烟台大学中文系,山东烟台 264005)

提 要 中国修辞学在《修辞学发凡》的雨露滋润下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分支学科相继创立,修辞理论臻达、系统、严整;修辞学史从幼到壮;分析方法日趋合理多样,强有力地推动着汉语语用理论的成长,规约着社会语文实践活动的健

康运行。本文拟结合望老相关学术思想，集中就语体风格谈谈现代语体学和风格学的创立和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 语文体式 语体 风格形态 语文实践

一、语文体式与语体

1. 语文体式与其相关概念

语文体式与语体作为特定概念在《修辞学发凡》中多次出现。“语文体式”由“语文”和“体式”构成。在《发凡》里其语义所指十分明确，即口头讲的话语和书写的篇章，合而并之为“语文”。学界纠结的是“体式”，与其同现的有：体类、体制、体裁、语体、辞体、辞类、文体。1932年初版(大江版)第十一篇的篇目为“语文的体类”，1945年版(重庆版)改为“辞白的体类”，1954年版(上海新文艺版)易为“语文的体式”，并解释说“语文的体式就是语文的类型”，“语文的体式，我们本来可以简称为‘文体’或‘语体’。但‘语体’，现在已经用作口头语的别名，而‘文体’，又被一般辨体者辨得琐碎，头绪繁杂。为避免混同起见，我们不如直接称它为语文的体式”。1959年版(上海文艺版)更变为“文体或辞体”，并指出：“文体或辞体就是语文的体式。”^①自此以降，该篇目一直沿用下来。从望老对篇目的改动及随文解释来看，“语文体式”是正位，其他均为偏位。偏对正来说，起着一种注释作用。也就是说，“语文体式”既可理解为“语文的类型”，也可解释为“语文的文体”或“语文的辞体”。在其随文论述中，有时也释为“体制”“体裁”或“辞类”。在作者的心目中，这些不同的概念连同“语体”，都可作为“语文体式”的同义互释。之所以不使用“语体”，因为已被“口头语”所占用。既然“语文体式”是正位，又为何不以“语文体式”一以贯之？纵观全书不难发现，《发凡》是由两大基石支撑：一是修辞原理；一是语体风格。前者意在理论阐发，后者则重在例释审美形态的本质特征。窃以为，作者之所以反复斟酌更换篇目，是在寻找更贴近汉语

^① 参见李熙宗 1.《“语文体式”概念的创立与〈修辞学发凡〉体系的构建》，载《千秋巨笔 一代宗师》(复旦版)，2013：300–312；2.《“语体”与“语文体式”》，载《掇沉珠集》(复旦版)，2010：152–162。

语用事实、更能全面反映与继承魏晋以来传统语体风格论的精华、更能统摄语篇理论整体的概念。语篇理论整体在《作文法讲义》开篇即点出：构造、体制、美质。既然《发凡》立意的宗旨立足于语用整体，故而选择能涵盖语篇构成整体的概念，自然成了作者心仪之鹄。由此反映了望老治学的精细和对语篇全局的深度思考。

2. 语体学的产生和发展

《发凡》问世八十余年来，中国的学术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望老当年在“语文体式”统摄下的相关概念，在学科深化过程中，均已发生了嬗变。“文体”在汉语语言学界由文章学和写作学领有，并兼并了“体制”“体裁”和“辞体”；《发凡》中所述口头语的彼时称谓“语体”，已与口语完全脱钩，自立门户，连同“辞类”“体类”均为语体所同化，与语体一起从修辞学中分蘖出来，成为一门新学科——语体学，且已为学界所共识。20世纪60年代始，林裕文、张弓等率先使用了这一概念。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语体研究由从属地位逐渐独立。以李熙宗先生为代表的复旦学人，在陈望道学术精神激励下，在现代语体学建立的进程中，起了独特的作用。1982年夏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纪念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出版五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首次设“语体风格”专题讨论；在全国，首次开设了“语体风格”专题课程；首次招收语体学硕士、博士研究生；还在《修辞学习》设置专栏研讨语体风格（李熙宗2016a、2016b；刘大为2013）。截至21世纪前十年，冠以“语体学”名目、用汉语写就的专著，就有三十部之多。

3. 语体研究的瓶颈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持续升扬。汉语的语体研究，近十年来，出现了迂回与停滞。笔者认为语体研究“瓶颈”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3.1 就外部而言，三十年来的语体研究，多存在语体与使用域的依存关系上，并由此出发划分语体类型，在类型的基础上，再作语言特征的提取和表达体系的归纳。一旦提取与归纳到极致，无新意可谈可论时，自然不会有再作重复性的劳动。客观地说，任何事物刚出现时，对研究者来说，从哪里入手都能有所收获，到处都有等待开发的空间。然而当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此层面可以研发空间几乎都已论及，此时必须有新理论、新方法、新的突破点，方能有转机。就认识规律而言，任一事物发端时，人们多注意客体的表面和可把握的形态，随着研究的深

入,以及相关学科发展的触动和言语实践的检验,客体所固有的缺陷逐渐显露,首先是与言语实践发生矛盾,此其一。

其二,时代的演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各式各样的大众传媒的发展与普及,急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语文形态,原有的以阅读经典为主的高雅社会语文生活,正在由俚言俗语恣意调侃,或华洋杂糅译味十足的语文体式所替代。原有规则被突破,许多新词、新语、新语序、新表达像走马灯一样被快速地轮换着。作为与社会语用实践相与共的语体学,面对这种情势,仍墨守原学术秩序,自然要滞后。

其三,诚如索绪尔所言,言语活动“我们还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1980:30)。2016年是《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一百周年,百年前哲人就已预见到作为言语活动的重要部分——语体会有的遭遇。当下的学术生态环境虽然较百年前有了极大的改观,然而揭示人的心理结构的相关学科则尚未成熟。

3.2 就语体内部而言,首先是俄苏功能语体论的影响。功能语体学从其生下来就先天不足,最先引进者又未加批判地拿来。1957年高名凯先生率先将俄苏语言风格大讨论的情况,较为详尽地介绍到中国,接着(1959)又发表了《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长篇报告。此文将语言风格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几乎都做了论述。接踵高先生步履的俄语背景人士王德春、张会森及修辞学界的程祥徽、黎运汉、李熙宗、袁晖、郑远汉、张德明等,先后就功能风格发表了系列文章,出版相关著作。尤其是王德春先生,从1958年至2000年,就功能语体发表、出版了多篇、部论文、著作,对语体研究的本质、范畴、类型、类型间相互关系、语体学研究的意义等都作了介绍。王氏的介绍对亟待理论外援的汉语语体学来讲,无疑起到“及时雨”的作用。然而也将俄苏功能语体研究固有的病态基因带了进来:宏观上过于概括,微观上疏于精准。

其次是语体、文体、风格、体裁等概念之间的纠缠。这种纠缠源自译入文意的乖违。本来汉语中的风格、文体、体裁,尽管多解,但在语言与文学研究及语文教学领域,其语义还是清晰可辨,很少发生抵牾。然自20世纪50年代始,随着俄苏语体风格理论(*стилистика*)的输入,俄文中的*стиль*,英语的*style*,被汉译为“风格”“文体”“体裁”义,相继又有“言语风格”“语言风格”等汉译出现,因而就出现了风格即语言风格、语言风格即言语风格、言语风格即语体说。其实在俄苏风格论大讨论时,索罗金对风格(*стиль*)、言语风格(*стиль речи*)和语言风格(*стиль языка*)的分辨还是清

晰的，“言语风格”指个人风格，即风格；“语言风格”指社会集群所共识的风格，即语体。所憾因素罗金当时处于被批判地位，故其接近言语事实的意见，遭到摈斥。

3.3 严重脱离社会语文实践。本来生于言语实践，长于言语实践的语体理论，却在其发展壮大起来以后，片面地追求理论化，以致脱离了母体。语文实践最重要的领地是语文教育，六十年的语体研究，至今没有任何体系走进语文教学。

4. 汉语功能语体学的贡献

以上我们以如此严肃的话语来谈论此前的语体研究，绝无抑扬褒贬之意，因为笔者也是语体风格研究队伍里的一员。鉴于汉语语体学在发展道路上遇到了障碍，除障当是学界同仁的共同责任，故而作出了上述臆说。平心而论，六十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功能语体学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语体风格研究的开创者们在中国的贡献有三：

4.1 “语体为先”语用意识的凸显

从墨翟“立辞而不明其类，则必困矣”到宋倪正父“文章以体制为先”，历朝均有名言隽语予以强调。“语文以体制为先”已从方家的理论主张，逐渐融化为社会语文生活的准则，为智界所共识，坊间里巷所仿效。现代以来，因白话文运动的涤荡，伴随着文言文与白话文地位的置换，传统语体风格无论是理论，还是语文实践，都经受了空前的磨难。“言文一致”“我手写我口”这种体制上的革命，将原有的话语秩序完全打乱，其中包括对为文造语“以体制为先”的秩序，均遭到严重冲击，结果在社会语文生活中，文不对体，语不入规的现象彼伏此起。此种流弊如同慢性瘟疫般在流行，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识之士不断惊呼语文危机。程祥徽先生（1993）适时地提出在语言运用中“语体风格领先”，在此后的岁月里，尤其是“语体风格论坛”的历次会议上，语体为先的主题始终处在凸显地位。由于舆论倡导，“语体为先”的语用原则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4.2 “得体原则”得到强调

“得体原则”是指符合语体要求的交际原则。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1996：342—400）中，以近六十页的篇幅，从微观到宏观对“得体性原则”作了纵横论述，认为得体性是修辞的“最高原则”。此论言之成理。具体讲，所谓“得体”是指言谈话语需要入体、适体、合体。因为这个“体”不是个别的语词或声律、构式，而是一个文化群体言语活动的原则和准则，所以说它是由言语社群经历时磨合所共识的契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